

“五四”时期鲁迅的民主与科学精神

中文系《热风》注释组

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把我国历史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这场划时代的革命运动，首先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出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毛泽东选集》第522页）当时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文化同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新文化运动的先觉者，一开始就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他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鲁迅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向敌人冲锋陷阵，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和主将的。

—

旧中国是一个受封建主义统治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国家。辛亥革命之后，列宁就说过：“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弱点，不可能真正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革命。这正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展一个更广泛、更深入、更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就成为新文化运动首先面临的重大任务。恩格斯指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革命“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也是为行将到来的政治革命作了开路先锋。

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的范畴，它具有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内容。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主的意义，就是要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因此，“五四”时期鲁迅的民主精神，也就集中表现在他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鲁迅这一时期的作品，正是他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反动腐朽的思想文化作斗争的产物。鲁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因而他对旧势力的攻击也特别有力，是旁人所不可及的。他的批判锋芒，不仅针对现实，而且深入到历史的领域，把历史同现实联系起来，使人们更能看清封建主义的反动性，激发起对它的憎恨和推翻它的决心。早在“五四”前一年，当鲁迅发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都包括在“吃人”二字中时，他就大声疾呼：“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使人民摆脱奴隶的命运，获得做“人”的资格，就成为鲁迅的民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鲁迅深刻揭露了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说：“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这“刀与火”，形象地概括了历来反动统治者的残暴罪行：他们为了追求“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一方面对人民实行敲骨吸髓的压迫和剥削，一方面争战不休，使人民遭受无穷无尽的灾难。这就是中国人民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可悲的命运。鲁迅怀着深广的忧愤，期待人民觉醒过来，学习俄国人民在十月革命中表现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奋起抗拒反动势力的暴虐统治，迎接时代的新曙光。

封建主义的“吃人”本质，不仅表现在有形的、物质的方面，也表现在无形的、精神的方面。几千年来，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残酷压迫的同时，也在文化上、思想上受毒害和奴役。这种杀人不见血的精神统治，在某种意义上说，比有形的压迫，更加厉害。鲁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认为改变国民的精神，是民主革命最迫切的工作。所以，他的批判矛头，更着重于指向文化思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直刺入人们的灵魂深处，而这方面的批判，也格外表现出鲁迅思想的深刻性。

中国虽然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的教会的精神独裁，但是中国有封建礼教，有以儒家教条为核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对人民实行着极其严密和专横的精神统治。“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长期的文化专制，使中国人陷入了“无形之囹圄”，精神麻木，已经到了“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的可悲境地了。可怕的是，“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一代一代往下传，使后来的人不由自主地被“几百代的祖先”所支配，它的毒汁浸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这种“历史和数目的力量”造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习惯势力，千百年来，使无数无辜者不明不白地“做了旧习惯的牺牲”。人们的天性都泯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头脑僵化，失去了容纳新潮流的精神。鲁迅清醒地看到，当广大群众在封建主义长期黑暗统治下形成的愚昧麻木状态没有得到改变以前，任何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革，都是没有真正实现的可能的。他在“五四”前夜写的小说《药》，就是通过一个人血馒头的故事，展现了一幕旧民主革命时期的悲剧。革命者的血，被蒙昧无知的群众当作了医病的“药”，历史的教训，还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么！鲁迅慨叹道：“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又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所以反对愚昧落后，就要来一个思想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帮助人们挣脱封建的枷锁，打开心灵的窗户，放进新鲜的空气来。

辛亥革命以后，伴随着政治上的反动逆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尊孔复古之声，也甚嚣尘上。孔教会、孔道会之类反动社团，遍及全国，历届北洋军阀政府，无不提倡尊孔读经，甚至有人主张宪法明文规定以孔教为国教。“孔家店”是民主与科学的死对头。从政治上看，“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第2号）；从思想上看，孔学是“助成昏乱的物事”。因此，尊孔与反尊孔，是“五四”时期思想战线上最激烈的斗争。批判孔教，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课题之一，也是“五四”时期鲁迅战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他除了在小说中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揭露了旧制度、

旧礼教的吃人本质之外，还用杂文这锐利的武器，从多方面对儒家思想和教条进行了揭露批判。《热风》中大部分杂感，是对于社会和时事的短评。它鞭挞了形形色色的“国粹”派和封建复古派。鲁迅用辛辣的讽刺，揭露那些死抱住“国粹”不放，顽固拒斥民主和科学新思潮的人，是如此反动和荒谬：“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学理法理，既是洋货，自然完全不在话下了。”他愤怒地谴责“圣人之徒”鼓吹三纲五常，是“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他指斥复古主义者是“现在的屠杀者”，扼杀了“现在”，也就断送了民族的将来。他还揭露儒家的经史典籍，不但是封建统治者“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我们的思想工具。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进步，他断言：“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这些深刻的思想，有力的语言，对于人们冲决封建罗网，接受进步思潮，起了巨大的启发和鼓舞作用。

早在辛亥革命翌年，鲁迅就发出“专制永长，昭苏非易”的感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毛泽东选集》第959页），因此，“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与个性解放联系在一起的。要争得“人”的地位，首先要有“人”的觉悟。鲁迅在他的第一篇《随感录》里，就表示期望新的一代成为“‘人’的萌芽”。这带引号的“人”，是从传统观念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用现代进步思想培养起来的人，是“完全的人”。反对旧礼教，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是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青年的切身要求，当时许多青年的觉醒，正是从这里开始。当鲁迅收到一个不相识的少年寄来一首诉说“爱情”苦闷的新诗时，不由得赞叹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他高兴地看到受了几千年压抑的天性在青年身上复苏了，可见“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满怀激情地鼓励青年们大喊大叫，“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

解放个性，又是和反对迷信和盲从分不开的。“五四”时期，流行着“破坏偶像”的口号，提倡怀疑精神。这正是时代的大转变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当时社会上多数人还是崇拜旧传统，“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统治阶级卫护着旧制度、旧思想。鲁迅把这种保守力量称做“合群的自大”，他针锋相对地主张“个人的自大”，提倡“独异”精神。他希望青年不顾别人的冷笑和暗箭，敢于做“偶像破坏者”。应当看到，他反对的只是对旧事物的盲从和迷信，不是要人们抛弃一切信仰；相反，他认为一个人必须内心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才能有“确固不拔的自信”。他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意思是要信仰科学，信仰真理，信仰进步。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把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并举，是因为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就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来看，从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科学理论和技术的进步，

不仅推动了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还为战斗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提供了自然科学的根据。科学家们正是用自己的成果，“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页），摧毁宗教的精神统治，有的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开始就充分注意到西方近代科学对历史发展的革命影响。

鲁迅从来热心于宣传科学。早在一九〇三年，当他翻译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时，就指出科学具有“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伟力。“五四”时期，他明确的指出，要救治我们昏乱的祖先遗传下来的“昏乱病”，对症的药“就是‘科学’一味”。

鲁迅所讲的科学，不光指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具体应用而言，而且是从哲学的高度，把科学看作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他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科学和鬼话是誓不两立的，而讲鬼话的人，恰巧就是维护旧制度、旧秩序的人，所以，提倡科学和提倡民主，就紧紧联系在一起了。鲁迅曾建议《新潮》杂志，不要登太多“纯粹科学文”，“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在这里，鲁迅就是把讲科学和反封建斗争结合在一起的。鲁迅与一般“科学救国”论者不同，他虽然重视科学，但并不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单纯的科学技术就能改造中国。他首先是把科学作为思想武器，批判种种反科学、反民主的事物，做群众的启蒙工作。

当时有些封建复古主义者，为了反对新潮流，不惜自欺欺人，盲目自大，甚至以落后和丑恶为光荣。鲁迅对这种愚顽保守思想痛加鞭笞，嘲讽这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他警告说，“倘使不改现状”，这样的民族就只有“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鲁迅反对逃避现实，粉饰黑暗和安于现状，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为必须敢于正视和反抗黑暗现实，前途才有光明。因为“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当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时，封建顽固势力除了竭力提倡尊孔复古，以抵制新思想的传播外，还使出种种“巧妙”的手段来捣乱。其中之一是，“先把科学东扯西拉，属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把人的头脑搞乱。鲁迅列举的事例中，最为突出的是一位名叫江希张的“神童”做的《大千世界》一书。这是一本内容极端荒诞反动的迷信书，却偏偏要把科学拉扯进去，说什么“科学以开知识，宗教以修德性，……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在宣扬魂魄轮回的鬼话时，又煞有介事地胡诌一套关于宇宙星球的奇谈。针对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鲁迅痛加斥责，并且严正指出，要救中国，“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科学最尊重事实，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在人类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使人们能够运用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正是说明检验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623页）。鲁迅以《事实胜于雄辩》为题写的一篇杂感，就是通过买鞋子的小事，讽刺那种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文章虽小，含意却深。站在反动立场或受反动阶级思想影响的人，总是不愿或不敢正视客观事实的。除了那些粉饰太平的“爱国大家”之外，新文化运动右翼代表人物胡适，当时不也是在“实验主义”

的旗号下，宣传什么客观存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任意由我们装扮吗？当然，胡适挂着“科学”的招牌，贩卖反科学的货色，其手段比鬼话连篇的“神童”和当面扯谎的鞋铺小伙计，的确“高明”得多，但他们的“精神”却是相似的。

“五四”时期的外来思想，十分复杂，真科学和伪科学，纷然杂陈，需要我们拿出眼光选择。但对于反动统治者来说，“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何况还有他们诬为“过激主义”的马列主义革命真理在，无怪他们要惊呼“来了”，象抵挡洪水猛兽一样，竭力阻遏。列宁曾说：“工人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臣们多么害怕知识和工人结合；你们应当向所有的人表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列宁全集》第2卷第68页）古今中外的反动统治者，都怕人民有了知识。我们的古人不是赞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境界么？所以他们总是奉行蒙昧主义，制造愚昧黑暗。五四新文化运动，象雷电一般，划破了漫天阴霾，让真理的光芒，射进人们的心扉。正如鲁迅所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终不能扼杀人类渴望前进的意志。

然而，当中国人民怀着饥渴的心情，从外来思潮中吸取营养的时候，却有一位哲学家在那里鼓吹“教育上的反智主义”，全盘否定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成就，把社会上的罪恶统统归根于“知识”。他说什么“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又说：“知识就是罪恶……什么道德哪！政治哪！制度文物哪！这些人造的反自然的圈套，何一不从知识发生出来，可见知识是罪恶的原因，为大乱的根源。”（《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京报》1921年5月19日）这一套偏激的昏话，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实际上是站到了革命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所以是十分有害的。鲁迅为此写了一篇类似讽刺小说的杂文，指出这种对文化知识的虚无主义态度，是要使人变成猪羊，“满脸呆气，终生糊涂，实在除了保持现状之外，没有别的法”，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它为统治阶级维持现状的反动实质。

鲁迅曾指出，杂文的特点，“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五四”时期这些杂文，大都是对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种种痼弊的针砭，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战斗性。一九二五年，鲁迅把这些杂文辑录成集时写道：“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由于所攻击的有害事物还未消灭，所以这些战斗的杂文就仍然继续发挥着白血球的杀菌作用。

三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封建运动，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但是也指出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事实上，他们鼓吹的“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他们津津乐道的自由、平等，“不是每个人

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7页）。根据资产阶级人权学说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并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从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发表《人权宣言》，到五四运动，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三十年的长途。资产阶级由上升的阶级转化成了没落的阶级，世界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跨进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五四运动开创的中国革命，就其基本性质来说，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它已经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同样，新文化的性质，也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文化，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这是一个新的伟大的革命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鲁迅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巨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658页）。

一定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动机，“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页）。“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虽然也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传统，但更重要的是，从时代潮流中得到的启发和滋养。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范畴，而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特点。

第一，鲁迅是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这就使他在立场上与以往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与新文化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了本质的区别。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尽管他们“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但是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从来就是骗人的谎言。孙中山也说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鲁迅的民主思想，和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不同的。鲁迅为之奋斗的，是为大多数劳苦群众所享受的民主。他的目标，是要彻底扫荡食人者，掀掉阔人的人肉筵席，毁坏安排这筵席的厨房，创造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而不是象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用资本主义剥削代替封建剥削。

鲁迅终生为人民奋斗，从不怀一己私念。他以解放人类为理想，首先是要解放下一代。他强烈谴责戕贼青少年身心的旧礼教，宁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岂是胡适辈宣扬的沉船时只管“救出自己”的利己主义所可同日而语！

无私才能无畏。正是由于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所以鲁迅从来没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没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这不仅表现于他和敌人斗争时，一点不避锋芒的大无畏精神，也表现于他在探索真理的途中，严于解剖自己的自觉革命精神。他勉励青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那时他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这样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又岂是个人主义者所能想象！

第二，鲁迅是在共产主义文化思想指引和影响下战斗。“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之所以

区别于“五四”以前的新文化，根本的一条，就在于这时产生了共产主义文化思想这一崭新的文化生力军。鲁迅当时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取同一的步调”，并且听他们的“将令”的。

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之下发生的。一九一九年元旦，李大钊就指出，十月革命带来了“新纪元的曙光”。同年五月，鲁迅在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也讴歌了这一“新世纪的曙光”。曾经由于经历了旧民主革命的失败而苦闷的鲁迅，这时虽然还不可能对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有真正深刻的理解，但他确实由此受到启发，依稀看到中国革命新的前景。当北洋军阀严厉查禁“过激主义”的时候，鲁迅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的“有主义的人民”；而紧接着，胡适却叫喊“少谈些主义”，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新文化运动，是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文化革命运动，鲁迅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斗争纳入到这个运动中去。他称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学”，他“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所谓“前驱者”，只能是作为新文化统一战线领导成分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鲁迅说“当然须听将令”，不仅表白了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和接受“前驱者”思想领导的自觉性，而且提出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命题。这一点，对于理解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和作品，是很重要的。

第三，鲁迅表现了五四运动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精神。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革命中途和封建势力妥协。“五四”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从资产阶级手里取过了革命领导权，这就使五四运动具有了辛亥革命所未有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

对于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鲁迅是深有感受的。辛亥革命过后不久，他就看到“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对他刺激最深的，是目睹旧势力的凶残、狡猾和革命者的软弱、动摇。难忘的历史教训，使鲁迅认识到对旧势力斗争，必须坚决、彻底而持久。“五四”时期，他那表现深切和格式特别的小说，犀利泼辣深刻有力的杂文，无不贯穿着最强烈、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时代精神，展现了他所特有的韧性战斗的风格。

鲁迅深恶折中主义和中庸思想。他指出，中国人“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才能生存和进步。如科学虽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他认为必须是掌握在思想进步的人手中。倘若“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那不过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非但无益于社会进步，而且“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所以，必须彻底改革社会，才有出路。

新文化运动内部存在革命和改良两条路线的斗争。鲁迅坚持彻底革命，反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就在新文化阵营分裂，《新青年》团体散掉之后，他始终还是坚持了“五四”文化革命的正确方向。

从上面谈到的这些方面，可以看到在十月革命后的新形势影响下，鲁迅思想上出现的新因素。当然，这个时期鲁迅也有他的局限性。当时他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没有掌握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作为他的社会历史观的理论基础的，主要是进化论，而不是阶级论。他基本上是以生物进化的观点来看社会，以是否有利于进化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因为新陈代谢“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所以，用他后来的话说，“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正是基于这

样一种信念，他坚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为后人战取光明，始终站在进步的、革命的一边。但是这种“进化”毕竟是抽象的观念。怎样才能使中国人在世界上“与种种人协同生长”呢？“超过祖先的新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废物又靠谁来扫荡呢？对于革命的道路、前途，以及革命的主要力量等问题，鲁迅这时还不能作出更为具体、明确的回答。“救救孩子”的呼声，的确撼人心魄，曾经震动了思想界，可是他后来回想起来，也还是觉得太空洞。

个性解放，是“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武器。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性”是用来对抗宗教的“神性”，主张人性的解放，是为了反抗封建君主和教会的压迫，所以是进步的。但要看到，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抽象的、普遍的人性。资产阶级惯于把自己的阶级本性，冒充为普遍的、永恒的“人性”。这样，我们在谈到个性解放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时，不能不注意它的阶级实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个性解放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我们要求的是“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毛泽东选集》第959页），而不是发展资产阶级那种自我扩张损人利己的个性。由于鲁迅这时还不是用阶级分析的理论去看问题，所以他的出发点虽然是谋求广大劳动群众的解放，但他的一些提法，是模糊的。如提到“人”、“天性”、“人情”等概念时，都带有抽象的人性论的色彩。同样，他在介绍西方一些思想家、文学家时，虽然意在激励人民群众冲破旧传统旧思想的束缚，但对他们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偶像破坏者”而加以肯定，也显得缺乏阶级观点和辩证法。诚然，鲁迅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阶级压迫的存在，还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但这种主要由直感得来的朴素的阶级观点，还没有上升成为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体系。

鲁迅的斗争实践，是同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是他在主观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当时还只看到少数“先驱者”而没有看到群众的力量，所以在作品中有把先进的个人与“庸众”对立的提法。唯其如此，在《新青年》团体散掉了之后，就产生了孤军作战的苦闷感，“荷戟独彷徨”。可贵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境遇里，鲁迅也没有减弱他的“永远进击”的精神。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在与敌人战斗的同时，他的世界观也经历着深刻的矛盾斗争。在艰苦的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同样体现着他的深沉坚韧的作风，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终于掌握了真正的科学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